

# 应当重视和加强 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

朱 学 兰

打倒“四人帮”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停顿了十年之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地开展起来。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水平，进一步开展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即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如实地估计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的状况，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在此基础上更快更有效地开展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对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最为落后。跟“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研究工作比，它是落后的，跟同是抗战文学的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工作比，它也是落后的。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当然，对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我们的前辈是作过一些工作的。我们从建国前的报刊和图书中，可以看到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研究论文。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一九四七年田仲济同志以兰海笔名出版的专著《中国抗战文艺史》。这本小册子简略地勾出了抗战八年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书中论述的一些问题，今天看来虽未必精当，但它提到的作家作品比较多，为建国后的文学史著作所少见。所有这些著述，对我们了解抗战文学的真实面貌，了解当年抗战文学的研究水平，应当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整个研究工作的状况看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及其它原因，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工作，成绩是不大的，有关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不多，专著更少。

一九四九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茅盾同志代表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为我们勾画了国统区抗战文学发展的大体轮廓。之后，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如王瑶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叶丁易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对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之争、作家作品，也有所评述，但都比较简略。对国统区抗战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研究的专著，我们还一直未能见到；甚至一本比较能够全面反映抗战八年文学面貌

的作品选本，也没有找到，既没有这样的诗歌选，也没有这样的小说选、戏剧选或散文选。研究工作的这种落后状况，无论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伟大时代，还是对于当年轰轰烈烈的血与火的八年抗战，都是很不相称的。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工作的落后，是不是因为国统区抗战文学值不得研究呢？事实并非如此。国统区抗战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丰富多采的，比之“五四”时期的文学和“左翼文学运动”时期的文学，比之同时期的解放区文学，未必逊色。它有自己的发展历程，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研究它的特点，探索它的历史过程，如实总结它的成就和缺点，这是提高我们今天文学研究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所需要的。

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贯穿着“五四”以来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文学运动，这一特点，并非国统区抗战文学所独具，但是，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文学统一战线却不尽相同。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统一战线，跟“五四”以来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文学统一战线相比较，它的“范围更放大了”<sup>①</sup>。它包括了过去没有能联合起来的不同文学流派，比如在二、三十年代对“左翼文学”表现了不同程度排他性的现代派和新月派，也包括了“五四”文学革命曾加以扫荡的封建文学的一派——鸳鸯蝴蝶派，甚至还包括了曾经是“左翼文学”对立面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文学派别，如“中国文艺社”。抗日救亡，把不同阶级、不同政见、不同文学流派的文学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了鲁迅先生生前所期望的文艺界的广泛联合：“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sup>②</sup>这个文学统一战线的规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吧！

与统一战线“范围更放大了”这一特点紧相联系的，是另一特点：文艺战线上不同倾向、不同派别的力量间极其曲折、复杂的斗争。抗战八年中的国统区抗战文学，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迫下，在不断的苦斗中发展起来的。这跟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相近之处，但由于它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斗争更为复杂、曲折、尖锐。这就需要更灵活、巧妙地掌握斗争的机微和分寸。抗战八年中国统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不仅表现了经过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锻炼的文艺工作者斗争水平的提高，更表现了具体领导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高度成熟的领导艺术。这中间有多少丰富、生动的斗争经验需要总结啊！我们多么期望能够读到一本详尽叙述、生动描绘、深刻总结这一阶段的文艺斗争历史的专著啊！

在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斗争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对国统区抗战文学在“两条战线”上所进行的理论论争，都注意到并论述到了。比如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对“战国派”的批判，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关于“主观论”的讨论，一般都有所评述。但是，对贯穿国统区抗战文学的一场重要的理论斗争，即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斗争，似乎还注意得不够，特别

是从理论斗争的角度去研究，就显得更不够了。

对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的斗争，是贯穿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始终的。斗争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文学理论领域，则集中表现在这一问题上：国统区抗战文学应以歌颂为主，还是应以暴露为主；是暴露黑暗，还是不准暴露黑暗。这场论争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在抗战初期的武汉，这场论争即由洪深同志的剧本《飞将军》和张天翼同志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所引发。《飞将军》以“暴露抗战中的颓废倾向，指出这倾向的错误”为主题；《华威先生》则辛辣地讽刺了敌视抗日群众运动、对抗战包而不办的国民党文化官僚，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华威先生》曾被日本帝国主义翻译过去，加以歪曲引用，借以攻击和诬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而引起了国统区文艺界的争论。国统区抗战文艺应该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暴露为主呢？当时，一些文艺工作者出于爱国的民族感情，主张以歌颂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文人，为维护他们的统治，一开始就反对暴露在其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在武汉撤退的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图书审查委员会，限制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进步书刊的出版。武汉失守以后，他们又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日益暴露了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国统区社会也更加黑暗和腐败。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团结教育国统区广大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日，“暴露黑暗”成了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主要任务，也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比如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同志写的旨在揭露反动派卖国投降罪行的历史剧——《屈原》，就轰动了整个重庆城，给了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十分惧怕这类“暴露文学”。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所宣布的文艺政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准暴露黑暗。国统区文艺界对此曾“从各种角度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sup>①</sup>，并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继续对国统区的社会黑暗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反动派千方百计查禁进步文学作品，禁演进步戏剧，也从反面证明了暴露文学的政治影响和战斗威力。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暴露为主、是暴露黑暗还是不准暴露黑暗的论争，构成了国统区文艺战线上反对国民党文艺政策、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集中点。这既是理论的斗争，也是创作实践上的斗争，在国统区更具有直接的政治斗争意义。我们应该重视和研究这一斗争，并给国统区的“暴露文学”以应有的评价。在这点上，我们的研究愈充分、愈深入，愈有助于把握国统区抗战文学与同时期解放区文学的不同特点，避免评价国统区抗战文学中的简单化倾向。

国统区抗战文学创作的丰富多采，硕果累累，更值得我们瞩目和研究。比如，在文艺的普及和群众化方面，较之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就有新的进展。抗战初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小型文艺作品，报告文学、速写、特写、活报剧、街头剧、街头诗、传单诗、朗诵诗、群众歌曲……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迅速反映了急速变化的战争形势，在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文艺与抗战、与群众结合的广泛深入，是过去的文艺所不能比拟的。再如国统区戏剧的发展，从总的方面来说，也是超过了二、三十年代的。在整个国统区抗战文艺中，戏剧是活跃的部门，戏剧创作的名家绝大部分会萃于

国统区。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洪深、老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宋之的、欧阳予倩、吴祖光、沈浮、熊佛西等同志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连从来不写剧本的茅盾同志，也由于“朋友们的鼓励”，在抗战胜利声中写了他迄今为止的唯一剧作《清明前后》。有了这么多著名剧作家的参与，戏剧运动得到了极大发展。戏剧节演出，雾季演出，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会演出等等，表明了剧运的生动活泼。戏剧创作的产量之丰富，也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历史上少见的。据田进在《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一文中的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仅多幕剧就有一百二十余部。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屈原》、夏衍同志的《法西斯细菌》、曹禺同志的《北京人》、茅盾同志的《清明前后》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诗歌创作方面，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诗人们的努力探索下，诗歌创作的领域有了新的开拓。抗战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倍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更丰富”<sup>④</sup>。以著名诗人艾青同志为例，他在抗战前写过《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诗坛上初露头角。抗战爆发后，诗人热忱地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在国统区写下了《向太阳》、叙事长诗《火把》等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特别是他的“照亮了人民的眼睛”的《火把》，在国统区青年知识分子中广为传诵，产生了很大影响。田间、何其芳、臧克家、卞之琳、力扬……许多诗人，把自己的诗呈献给了战斗中的祖国和人民，丰富和充实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的诗歌创作。小说创作也硕果累累。在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上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著名作家茅盾、巴金、老舍等同志，又为抗战文学增添了新的光辉。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腐蚀》，可以说是国统区暴露文学的代表作。老舍同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是他献给抗战文学的“纪念品”。巴金同志在上海沦为孤岛时的炮火声中，完成了他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春》和《秋》。“左翼文学”时期已经知名的作家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同志的小说创作，在抗战时期也有了新的进展，突破了他们原有的创作水平。比如张天翼同志，抗战前即以多产闻名，但他最成功、最负盛名的作品还是抗战文学《华威先生》。又如沙汀同志颇受人称道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的茶馆里》，也表明了作者深沉、幽默的创作风格更趋成熟。抗战初期，姚雪垠同志以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为广大读者所注意，这篇作品作为抗战文学初期的优秀成果，曾被介绍到国外。以上挂一漏万的举例，当然远不足以说明国统区抗战文学的成就。

国统区抗战文学是丰富多采，富有特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但我们的研究工作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应该说，这与五七年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左”的影响和干扰有关。在“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下，研究历史而又不尊重历史。在教学和研究中，现代文学的历史被涂改了，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也往往撇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撇开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以“政治风向”为标准，决定作家作品的取舍。这样，一次政治运动从文学史上刷去一批作家，刷去一批作品，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当然越来越少。这种情形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更是恶性发展，许多作家作品无辜地牺牲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棍子之下。因人废言，因人废作品，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

情。发展到后来，就是取消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组成部分的国统区抗战文学，当然也不要了，何况国统区抗战文学与“国统”沾边，“嫌疑”尤大，谁还敢问津呢？

这是就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具体问题还应作具体分析。我认为，障碍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而上学地理解毛泽东同志“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倒退落后的地方”这一论断，不愿或不敢放手研究国统区文学；即使研究，也不从国统区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以解放区文学为尺度或“模式”来要求国统区文学。这就严重束缚了研究工作者的思想和手脚，使研究工作难于深入开展，更难于对国统区抗战文学作出正确、公允的评价。

应该看到，国统区抗战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sup>⑤</sup>。解放区出现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sup>⑥</sup>。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已为历史所证明。一九四三年以后，《讲话》在国统区传播。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学习、贯彻《讲话》的精神，在坚持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努力向人民靠拢，更自觉地揭露国统区的社会黑暗，反映国统区广大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时期产生的一批优秀作品，也是属于人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国统区抗战文学在总的方向上是跟解放区文艺一致的。

但是还应看到，由于这两种文艺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表现出差异。在这点上，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比如，为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可以作到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sup>⑦</sup>。然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则难以作到这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sup>⑧</sup>当时重庆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就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迫之下，没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茅盾同志曾经形容过国统区作家的艰难处境：“呻吟于生活重压之下，思所写作而动辄触犯禁忌，思欲深入社会以充实生活，则障壁重重，处处遇鬼打墙。”<sup>⑨</sup>在这种情况下，国统区作家怎么可能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呢？郭沫若同志说：“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sup>⑩</sup>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评价这两种文艺时，就必须从他们各自的实际出发，这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建国前，在对国统区抗战文学某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硬搬解放区文艺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比如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研究国统区文艺工作时，就有文章认为：“我们从前喊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章进工场’那样的口号，过细考究起来，其实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喊‘文人下乡’、‘文人入伍’、‘文人进工场’，而说到文章上来呢，倒应该是‘文章出乡’、‘文章出伍’、‘文章出工场’了。”<sup>⑥</sup>甚至还说：“我们的路是走得太错，而且错得太厉害了。”<sup>⑦</sup>这些看法作为一种力求贯彻《讲话》精神的积极愿望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作为文艺工作的具体主张，就显然脱离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的实际，对国统区抗战文学成就的估计也是偏颇的。还有一些文艺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当时在用《讲话》精神检查国统区文艺运动时，也往往把国统区文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看过了头。在茅盾同志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中，对国统区文艺的创作成就，肯定的也还很不充分。这些，自然不能不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再加上上面提及的建国后的“左”的干扰，对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工作的长期落后，就不难理解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措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形成了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建设“四化”的新局面，给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工作已开始受到国内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视，有的同志并已在认真扎实地进行。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去年夏天，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专门讨论了中国抗日时期的文学运动。我们相信，在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切实贯彻“双百”方针，继续解放思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定能够改变落后状况，把国统区抗战文学的研究工作健康地开展起来。

一九八一年二月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②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

③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④ 艾青：《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文艺阵地》第六卷第四期）

⑤⑥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⑦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⑨ 茅盾：《为诗人们打气》（《茅盾文集》第十卷）

⑩ 郭沫若：《洪波曲》（《沫若文集》第九卷）

⑪ 郭沫若：《向人民大众学习》（《沫若文集》第十三卷）